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徐 瑞 康

一、在对外开放的时代，开展西方哲学史研究应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

在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学术领域里西方哲学史研究事业获得显著的成就，这是学界所周知的；实行改革开放，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显然又使得西方哲学史研究面临种种新情况。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的一切都感到有兴趣，他们希望了解、研究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西方哲学及其历史。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面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和西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挑战，又对社会科学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社会科学各领域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中间，它自然地也要求西方哲学史研究能促使我们科学地把握西方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和评价诸家哲学，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质和意义；能促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正确地对待外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化，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还能有助于我们锻炼和提高理论思维，因为我们的民族在改革和建设想要洞察自然和社会，“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正是这些新情况，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开展西方哲学史研究要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把方向问题提到首位。

事实上，任何人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都不能没有理论指导；如若没有理论的指导，西方哲学史就将构不成为一门有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独立的学科。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作指导。对我们来说，要真正地展开西方哲学史研究，就必须要有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的诸家哲学占主要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是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或是中世纪封建主阶级的，或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西方历史上的诸家哲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片面的认识性质，即使是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英法德诸国哲学，它们在全体上也都是错误的。尤其是，这些哲学源远流长，形态各异，学派繁多，性质对立，所蕴含的争论重重，所具有的精华糟粕不和社会作用不同，表达它们的著作规模庞大，等等，情况错综复杂。而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若无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对外开放的环境里，我们的研究将很难不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从而我们将很难使这一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回顾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历程，我们将有更深切的认识。解放以来，有许许多多学者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西方哲学史，批判资

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史观。这时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与解放前的状况相比，显然在方向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对不少学者来说，那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持教条主义态度，致使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在一系列问题上具有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弊病。例如，对于西方哲学史只强调它是意识形态史而忽视其认识史的方面；认为唯心主义即反动，一概否定它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把哲学史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而忽视其他的种种矛盾；并只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性而否认其同一性；等等。这类弊病与当时国内“左”的倾向和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有关，但也确实表明，我们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尚未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使西方哲学史研究得以真正地解决科学理论的指导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春天。学者们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态度，清理了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上述弊病，使西方哲学史研究欣欣向荣。但是，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错误倾向。初是出现“信仰危机”论，次是提出“逆反心理”论，再是公然论证“过时”论，或鼓吹“真理多元”论，说“真理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多元真理中的一元，只能和其他学说处于平等地位，而无权处于指导地位”。这种倾向也影响了西方哲学史研究。这些年来在一些人心中，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那么“时兴”了，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似乎会“降低”学术研究的价值。在“西方文化热”中，对待涌入的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盲目推崇，良莠不分，等等。这种情况表明，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的挑战尚缺乏警觉，对社会上已出现的上述错误倾向的危害尚缺乏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决不当忽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对外开放的环境里，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为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进一步加强科学理论的指导已极为必要。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我们来说科学理论的指导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为什么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问世而宣告其诞生以来，至今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并非仅属理论范围内之事，而是与无产阶级的事业紧密相联系的。历史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独立地走上历史舞台，由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总结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经验才得以产生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发展而得到传播和发展的；并且在某些国家里也是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才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获得更深入的实现的。马克思在1844年就说过：“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②他在这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系，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完整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可是，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些人眼里仅仅被当作一个“学派”来看待，它所具有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被“淡化”了，“真理多元论”者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和指导地位便是这种“淡化”的显著表现。然而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

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③而在我们这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那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又怎能适应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这就从根本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历史上任何阶级的哲学要科学得多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而产生的^④，恰恰相反，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概括那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基础上汲取和改造了以往人类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而形成的。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⑤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引起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来的哲学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张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并十分强调社会实践，强调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⑥从前人们在宇宙发展的问题上或持形而上学的见解，或持辩证法的见解；后者即使象黑格尔曾对之作过重要的贡献，也仅持唯心辩证法的见解。直到马克思创立了唯物的和与逻辑学认识论相统一的辩证法，辩证法才开始成为“完备的理论”。还有，从来的社会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根源；说明了个人的活动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从而至多是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则恰恰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这两个主要缺点，“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第一次把社会历史理论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人类哲学发展中所出现的这一革命变革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我们时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剥削阶级的辩护词相妥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可是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所具有的这种唯一科学的认识性质被一些人漠视了；并且这也是“真理多元论”者藉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和指导地位的一个论据。然而，列宁说过，“俄国社会主义者愈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愈是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运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于俄国，则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愈有把握、愈加迅速”。^⑦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我们强调它是指导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也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此研究就很难成为真正的科学。

再次，众所周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⑧；在我们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它绝没有过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先推动欧洲工人运动，继又传入俄国和中国，在那里引起巨大的变化之后，世界的情况在各个方面已有许多变化：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现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挫折和挑战。但是，对于战后世界发生的新变化的科学考察表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其固有的矛盾和本质并没有消失；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它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简言之，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不能说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应当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趋势。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发展。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随客观情况和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恩格斯早就说过，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虽

其诞生是人类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也只是给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它决不当被看作是封闭的、不变的，而必须考虑无限生动的实际生活，包括几十年来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虽然我们曾教条式地对待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过理论落后于实际的困境；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以往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曾有过失误，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经过时。事实上，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已在改变这种状况，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生机勃勃，其创造性正在不可抗拒地获得巨大的实现。

我们还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有它的基本原则方面，这些基本原则经过迄今为止的实践的证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但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客观世界的特殊规律。就它来说，必须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发展。而它的往后发展的过程乃是它的本身不断地深化和丰富的过程，后来的发展了的观点并没有推翻而是包含了它原有的观点，比后者更深刻、更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还有另一方面，即是把其基本原则运用到一定条件下的实践而作出的在某一问题上的个别结论。这些个别结论曾经实践证明是客观真理，不过它们也仅仅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若超出这范围，它就变成谬误。因此这些个别结论往后的发展过程就常常是它本身在新的条件下失去效用而为符合新的条件的新的具体结论所代替的过程。这就是说，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结论随着条件的变化是会过时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则是永存的。诚然，在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曾有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我们不能笼统地对之一概拒斥，说它们对现代西方的现实问题没有作出一定的回答，对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没有作出任何的贡献。但是应当说，从整个来看，它们并没有反映时代发展的本质、方向，并不具有普遍真理的价值；因而决不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在本质上是当代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指导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若否认这点，我们的研究又怎能深刻地体现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然而这些年来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一些人心中竟时髦起来，“真理多元论”者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乃和这种时髦的“理论”紧密相联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所述，是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社会科学包括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的基本理由，和兼析“真理多元论”者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立论错误。此外，我们还应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在德国，原就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黑格尔曾说过，“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黑格尔的这段话极富有启发性，不仅说明了研究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的意义，即不了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难以深刻理解哲学本身；还说明了研究哲学对于研究哲学史的意义，即要真正把握哲学史就必须把握哲学本身。如果对它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我们就可以说，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更好地把握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逻辑进程和揭示西方诸家哲学的理论实质。关于这点，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解剖西方哲学历史的钥匙。这亦即是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对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的特殊理由。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实现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

要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首先要认认真真地重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这种学习和钻研，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从中寻找关于西方哲学史的某种现成结论，而是为着从它那里寻找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过去我们对其方法论钻研得太少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曾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企图藉此把普遍和特殊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研究具体地联结起来。这或许是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某种途径。这些年来，我们对青年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课程其意即在于此。

根据我们的实践，似应“多角度、多方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概括地说，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正确地了解和阐述西方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内在规律，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所树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重大历史课题的典范，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具体论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评析西方的哲学史家们的哲学史观，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观点，有比较，有鉴别，从这个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此外，回顾我们自新中国建立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历程，总结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等等。在我们看来，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实质作比较完整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达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从而有助于我们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内容上似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哲学史研究最根本的内容和要求应是详细地占有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实际材料。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西方哲学史是一门史的科学，其首要任务当在于揭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回顾以往的研究，在这个方面实有进一步反思的必要。例如，本来“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的产生都具有深刻的根源，包括经济、政治、科学等方面。因而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学说就都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它们的命运也都视它们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而定。这就是说，它们属具体的社会意识，而非纯粹的抽象意识。它们既具有认识的性质，又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们发展的历史自然既是认识史，又是意识形态史。而我们的研究有时把以往哲学的两种性质对立起来，从而发生这样的状况：有时过份地强调哲学史是意识形态史，而否认哲学史是认识史；有时在强调哲学史是认识史时，又走向了忽视哲学史是意识形态史的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哲学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正确地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乃是意识形态史和认识史的统一。

恩格斯在总结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曾科学地论述过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根据对哲学最高问题的不同回答提出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揭示了哲学中基本的特

殊矛盾。这是他把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所确立的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恩格斯在这里确立的是哲学史中的基本的矛盾，并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以往我们的研究曾把哲学史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曾使哲学史变得十分简单和贫乏。但后来在清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中又一度发生过否定恩格斯的上述科学论述，否定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存在这样的情况，显然这是另一种片面性。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述的意义就在于它科学地确定了哲学史中特殊的基本矛盾，从而为我们研究和揭示哲学认识历史发展的基础、进程和方向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如若否认这一论述的科学性，取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就将在确认和认识哲学发展内在规律性方面导致混乱。

仅上所述可见，在具体地揭示哲学思想发展规律性问题上要避免片面性似乎不很容易。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做得不够，而且在揭示每一个历史阶段和重要问题的哲学思想发展的特殊规律上做得更不够。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应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科学地认识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用这种规律性的知识来武装头脑，“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应当说，这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实现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曾先后出现过多种性质和形态的哲学理论和观点，这些哲学理论和观点中有许多在它各自所处的时代曾起过进步的社会作用，在内容上也蕴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对于这些我们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必须区分哲学的社会作用和哲学本身的理论是非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认识到以往的任何一种哲学在理论内容上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它们所可能有的真理性都是片面的。尤应指出，历史上有不少哲学理论对后人甚至对现实生活依然在发生重要的作用。现特以西方历史上的“人性论”为例加以说明。

在西方历史上，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它们在哲学上一贯宣传和运用人性论。这一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法国，在19世纪的德国都有明显的表现。其中尤以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人性论影响最大。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用人的眼光考察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如：或用人的政治法律因素，或用人的理性因素，人的利益因素等。但是，他们所讲的人、人性乃是抽象的人、人性。此外，他们还从抽象的人、人性出发谈论着“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利己主义”等等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这一理论在当时为法国政治革命起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它促使人们从宗教神学和君主制原则所造成的压抑下觉醒起来，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占统治的封建主义。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是西方历史上从神学史观向唯物史观发展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但是，这一人性论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所具有的抽象性乃是资产阶级把自己一个阶级的本性、利益和事业冒充为全人类的本性、利益和事业之企图的理论表现。它掩盖了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对于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日趋反动。然而，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直到今天也都还有它的不可低估的影响。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不正是利用它来解释“民主”、“自由”和“人权”，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其“和平演变”的战略么？！在我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不正是利用它来鼓吹“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论调，推行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么？！

由此又可以认为，西方哲学史研究必须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科学地评判西方历史上诸形态哲学的理论是非的工作；只有这样，这一研究才能有助于清理现实生活中的错误思潮，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也是西方哲学史研究实现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三，五十年前，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专门批评过一些人“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现象。他指出，他们“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②伴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往的这种现象以新的形式和规模曾再度出现。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还必须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正确地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的课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作为科学的本质要求和方面。

对于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实行封闭的方针，与世界文化隔离，是断然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新文化来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树立“整体性”观念，把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认识现代西方哲学本身，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从当代的角度俯瞰西方哲学的历史，更深刻地理解它们。据此我们也需要增进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考察。总之，我们应当充分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社会主义文化食粮的原料。历史已经表明，那种排外主义的方针是很错误的。

但是，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决不能盲目搬用，毫无批判地吸收。回顾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社会上所出现的“西方文化热”的历程，可以说，初期以早期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著作为重点，中期以西方科学技术革命和未来主义为重点，后期又转向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著作。这一文化热的掀起，一方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了人们对之良莠不分，盲目搬用的倾向。实际上西方文化及其核心西方哲学，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上的，均有决定其性质和方向的思想内容，是蕴含着精华和糟粕的矛盾综合体。因而对它们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这里所提倡的批判与那种简单粗暴，否定一切的“批判”完全是两码事；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批判武器的科学的批判，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的范围之内”，分清精华和糟粕，批判地吸取精华的有分析的批判；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获得原料，最后有肯定成果的积极的批判。因此我们决不当丢弃马克思主义的这把“解剖刀”，而应当锐利它的锋芒，充分地运用它于对外来的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之中。

再次，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的西方文化和哲学时还要充分地考虑我们的国情和需要。恩格斯曾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③这就是说，任何理论、观点都是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因而，即使某种理论、观点在西方的土壤上必然发生，适合西方的社会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就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因此，应当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凡有益于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都应当批判地吸收；凡有害于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都应当剔除。

以上所述，即是我们关于在西方哲学史研究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具体途径和重点内容方面的一些认识。此外，经验还告诉我们，尽管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理论上承认是一回事，在实际上做得如何又是一回事；为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确立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和战胜错误的观点，我们还必须贯彻双百方针。总之，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引导我们深刻地揭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科学地评判西方历史上诸哲学形态的理论是非，和正确地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因而，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乃是我们西方哲学史研究实现科学化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465页。

②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1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213页。

⑥⑩⑪⑫ 《毛泽东选集》第625、272、624、7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④⑤ 《列宁选集》二卷第441页。

⑦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2—83页。